

上 篇

1949~1979 年

日本国政府の海外協力事業の歴史を振り返る

摧枯拉朽记

——60军向大西南进军参加成都会战纪事

未明

一、坚定贯彻毛主席、军委的战略部署

1949年11月，贺龙向入川部队干部传达了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关于向大西南进军的作战方针和计划。贺龙说：“中央指示，我们要先慢后快。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留住胡宗南部队10万多人于川陕交界的秦岭、巴山地区，不要过分地对他施加压力。胡宗南部现在向巴山步步撤退。我们不要紧逼，我们的战略任务不仅是要解放四川，还要把这部分敌人消灭在四川境内，不使其溜到云南边境。我们现在动作慢一点，就是要待二野部队封住敌人溜向云南的退路，那时我们就要快速前进！把他们包围在川西地区，聚歼他们。”

11月下旬，坚守在秦岭天险的60军180师报告说，我539团前沿部队发现敌人前沿阵地人员减少，有撤退迹象。

60军军长张祖谅根据毛主席、军委对当前作战方针，指示180师要实施进攻性的侦察，弄清情况。若敌人主力撤退，要尾追前进，以战斗行动牵制敌人，不使其逃脱。

前卫师180师按照军部指示，尾敌向凤县前进。进至百凤关，歼敌164团一个营和一个保安团，俘敌300多人。

从俘虏口供中得知，敌人的主力3天前已经撤退。

60军军长张祖谅，指示前卫部队，为了不使敌人向川西流窜，不要急追敌人。前卫部队要积极侦察道路，补充给养，拟制作战方案，派工兵排除雷场，架好敌人破坏的桥梁，为追击积极作好准备。

11月18日，60军举行向大西南进军的誓师大会并接受兵团首长的

授旗。周士第司令员在讲话中强调要以生命保证军旗不受玷污。胡耀邦主任要求部队在向大西南进军中英勇前进，消灭残敌——到成都过年！为新中国开国立新功！

部队听了，情绪空前高涨。

12月上旬，二野部队占领了乐山、井研、内江、荣县、大足、垫江等地，切断了敌人逃往西昌、云南的退路。

此时，贺龙司令员下达了部队兼程前进、急速追歼敌人的命令。

担任前卫师师长的郑其贵，要求部队要迅速攻占巴山险阻，直扑敌第七兵团裴昌会的指挥部。对巴山的几道关隘，要以奔袭、强攻和穿插相结合攻占。强调积极果断，不恋战，不要事事请示，追上敌人，消灭敌人就是硬道理，就是正确的行动。

大巴山区的阳平关、五丁关、牢固关、七磐关、飞仙关，都是阻挡进军的隘口。

好多天，部队没有看到敌人的踪迹了。前卫部队急得嗷嗷地叫。在严寒风雪交加下追击敌人，每个人肩负30多公斤的重物，日行军100多里，许多战士脚上都打了泡，没有一个叫苦，没有一个有怨言。

部队前进到陕南沔县的大安镇，终于追上了逃敌的尾巴。前卫团一连发现敌人后，没有等后续部队到达，即向敌人开了火，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当敌人顽抗时，二三连已及时赶到，很快投入战斗，不到一个小时，全歼了一个团部、两个整营和一个专员公署。

一营的战斗还没结束，为了不让敌人喘息，二营又冒着风雪，急行军130里，又追上了敌27团和80团。敌人走投无路，被我军全歼。接着又追到宁强城，没费吹灰之力，俘虏了敌人几百人。继续向七磐关追击，碰上了敌29团。敌人居高临下，正面攻击难度很大。于是三营迂回过去，从后边攻击，不到一小时，又歼灭了这股敌人。

5天来，战果累累。前卫队538团连克五关，歼敌5个团。

12月14日，538团向广元的朝天驿追击时，师长命令540团向敌后穿插，切断敌人的退路。540团在急风骤雨中，翻山越岭，一昼夜急行军180里，占领了红土关，攻下了大巴山的6个山头，配合538团攻克了川北门户广元城。

540团又马不停蹄地直奔剑门关。

剑门关是进成都的咽喉，蜀道中最险要的关口，剑门关雄峰刺天，过

去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说。

这里的守敌是 55 师的一个团。关下栈桥被敌人破坏，山上有石碉，山头有工事，敌人以为万无一失。敌师长下了死命令，说打得全部死在关上，也不准后退一步。

为了攻克这个险关，540 团尚团长让三营正面进攻，一营侧面迂回。

部队各连争着当突击队，指导员都背着装有连队请战书和决心书的挎包到营里请战，不争到突击任务誓不罢休。

七连争到突击队的任务后，战士趁着伸手不见五指的夜幕，在山上摸着一个又一个石头，向关上攀登。恐慌的敌人，漫无目标地向下边射击、打炮，战士借着炮火一闪的光亮，辨认地形，待到他们爬到离关四五十米处时，看到了攻击的信号弹。各种火器响了起来。在火力的掩护下，战士们奋勇向关上冲去。敌人恐慌了，立即有一个排把敌人缴了枪。二排长随后进行政治攻势，四连进行搜索，敌人的团长率部投降，就这样，我军攻克剑门关。

剑门关破，539 团立即改为前卫，该团三营坐着刚刚缴获的汽车，浩浩荡荡地向川西平原驰去。

部队到达德阳，已经退下来的国民党裴昌会第七兵团已经失去斗志，正在联系解放军要求起义。

539 团迅速向广汉追击，副团长陈克难听说敌一个炮兵营找解放军投降，立即带一个排赶到广汉县连山镇。

他们到达连山镇时，发现镇内外公路两旁黑压压地挤满了敌军。有的躺着，有的坐着，像是经过长途行军，个个疲惫不堪。副团长看到这个新情况，沉着地命令一个排迅速控制了制高点，并让排长向敌人喊话。排长高声喊叫：“我们是解放军，你们赶快投降！”

这突来声音，惊醒了敌人。当他们看到我们已控制了制高点，吓得魂飞魄散，没有一个敢抵抗，纷纷举手投降。经过清查，一共有 4 个团的番号，约四五百人。

12 月 20 日的午夜，该团到达成都附近的新都县。一个自称叫刘子舟的新都县长前来迎接，说卑职已办好一切手续，等候大军前来接收。问他“为什么没跑？”他说，国民党气数已尽，跟着也是陪葬。问他附近还有没有国民党军队。他说，国民党的新编第一师昨天刚往赵镇方向去了。

王至诚团长没让部队休息，连夜追赶。追到姚家渡，在一个场坝上，

发现有 20 多个穿着呢子制服的军官在谈情况。这时，我们的指导员郑殿武一个箭步跳了过去，指向一个主要军官说：“让你们部队集合起来投降！那个军官糊里糊涂，说你们误会了；我们是新编第一师！”我们没有误会，我们是解放军，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赶快投降！”敌人拖儿带女，毫无斗志，乖乖地投降了！同时投降的还有附近西南绥靖公署的一个警卫团！

在这次向大西南进军中，60 军在将近一个月的战斗中，摧枯拉朽消灭了敌人 38000 多人，受降 24000 余人，解放县城 14 座。

二、成都人民喜迎解放军

12 月 27 日，困守在成都市区的国民党宪兵部队，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刘伯承司令员发出通电，宣布起义！

至此，成都取得了和平解放，云集在成都地区准备与我军会战的国民党部队被歼 50 多万人（包括起义、投降、歼灭的）。成都会战胜利结束！

兵团决定 12 月 30 日，60 军进驻成都，并举行人城仪式。

12 月 30 日这一天，成都是少有的好天气。成都市主要街道国旗高挂，彩旗飞扬，锣鼓喧天，歌声嘹亮。

一茬一茬的市民向北门外拥来，刚刚宣布起义的国民党的城防司令，也派出车队、军乐队到达驷马桥来欢迎解放军，在彭县宣布起义的国民党将领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也从彭县赶来成都欢迎解放军。

成都市万人空巷，都云集在主要街道的两旁迎接解放军入城。

解放区的先头部队抬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巨幅画像，文工团跟在两旁载歌载舞。

一队队学生打着腰鼓，扭着秧歌，满怀激情唱着刚刚学会的新歌“东方红”“解放区的天”“团结就是力量”歌声此起彼伏，响彻四方！

欢迎解放军的人们，呼着向解放军致敬的口号，有的亲切地和解放军战士握手，有的要求解放军给他签字。

站在楼上的人们着急得下不来，他们也欲表示自己的心意，只好用彩纸剪成纸花，从上边向解放军行列的战士抛去。

一个年轻的母亲，抱着自己的幼儿，为了表示对解放军的敬意和热情，把早已准备好的一束鲜花，交给手上抱着的幼儿，让他纯洁的小手，把

鲜花抛向解放军。

在入城式的部队中，开过来好多辆小吉普车。虽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但迷惑不解：他们看到里边坐的人，都穿着与其他干部战士一样的极为普通的服装，臂上佩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标志。人们诧异这么多的部队，怎么没见一个大官来呢？

不知是谁认出了贺龙的相貌，激动地喊了出来，人们沸腾起来，潮水般地拥了过来。人们纷纷议论着：“全国赫赫有名的大官，没看到有多少马弁，要是国民党有这么大的官员出来，后面的马弁得有几十个！”“看人家当官的和当兵的一个样！”

一个成都记者向贺老总提问：“贺司令官，请你谈谈大军进入成都的感想！”

贺老总诙谐地回答道：“记者先生，我们解放军没有官，只有员。我衷心地感谢成都人民热情的欢迎。”贺老总频频地向群众招手致意。

从上午 9 时开始，一直到下午 4 时，解放军在群众热烈欢迎中缓慢地行动着。解放军走到哪里，群众就跟在哪里，恋恋不舍地不肯离去。

当部队向驻地走去时，远处高喊“向解放军致敬”的声音还不绝于耳！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这是不可改变的历史规律。

作者单位：成都市老新闻工作协会



往事非烟却似火

饶鹏飞

人的一生，都会有许多自己难忘的故事。

记得那是 1950 年冬季，冰天雪地的朝鲜战场，炮声隆隆，烽火弥漫。其时，我在志愿军庆山部警卫连当文化教员。警卫连的战士，全是些相貌标致、机智勇敢的小伙。根据战争的需要，庆山部首长要我带着警卫连第八班驻守平壤通往前线的干道上，以接应后续部队。于是，我们便在金日成综合大学附近的要道岔口，找了一间没有主人、室内全空的贝式平房住下，并在道旁立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庆山部联络站”。

当时，庆山部在平壤郊区崮山里设了一个基地，我们这个联络站属那个基地领导。在我们驻军的干道上的岔路，直接通向崮山里。一个天色微明的清早，寒风卷着雪花，有辆苏式吉普车，尾部喷出一股黑烟，停在我们站牌附近。车上下来两个 20 多岁的年轻人，他们要找联络站的负责人。

“你是负责的？”年轻人问。

“……”我点点头，但没有回话。这时，吉普车前门开处，又走下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人，约 30 来岁，偏着头问我：“你多大年纪？”

“17 岁。”

中年人便说：“小同志，是这样：我们是新华社的，现在车上没有汽油了，不知你们能不能帮个忙？”接着，年轻人补充道：“他是我们新华社驻朝鲜分社社长刘桂梁。”接着他又把新华社是什么性质的部门向我们作了解释。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接触到的新闻界人士。我非常高兴，但又不能不提高警惕。于是，我要刘社长和两个年轻人留下，派出小孟和另一名战士同驾驶员到崮山里基地去提汽油。我写了一个条子给基地指导员李德芝，交小孟带着。

在小孟他们去提汽油的时候，刘社长向我介绍，他是山东人，燕京大

学毕业后参加革命，一直搞新闻报道。他要我学习写稿，反映战斗生活，介绍英雄人物，就此不知不觉地我被他牵上了爬格子的道路。约一餐饭功夫，小孟他们提汽油来了，说是李指导员欢迎新华社同志有机会时到基地去采访，纯粹作客也行。

刘社长风趣幽默，非常健谈。我们依依作别，这是 1950 年 12 月下旬。次年元月 3 日和 5 日，美军派出数百架 B-29 轰炸机，对平壤进行了两次“地毯式”轰炸，投放了大量高空引爆燃烧弹，无数火团铺天盖地，朝鲜的首都陷入一片火海。我们扑灭住房火焰，又去扑打金日成综合大学大楼正在腾腾燃烧的烈火，终因火势太猛，加以没有灭火设备，眼见这幢大楼毁于瞬间。之后，刘社长又驱车来看望过我们两次。原来，新华社与我们住同一条街道，他们住在一个防空洞内。元月 8 日午夜，敌机又对平壤进行大规模轰炸，一颗重型炸弹落在我们住房旁边，房子炸塌了，我和八班同志一起被埋在炸弹掀起的泥块下面。一根折断的房梁，扎在我的耳旁，它未能把我扎死，反而支起一个空间。我睡在炕头。挨着我睡的是八班长，他是东北人，个子高大，扛起斜歪的折断房梁，让我先从地下钻了出来，然后一个个互救“出土”。八班长呼唤全班每个人的名字，惟有孟宪章没有回音。约过 20 多分钟，才听到被炸弹掀到 30 米外的小孟发出呼号：“教员！班长……”我们摸黑扑了过去，小孟再也没有声息了……

战争磨炼了我们的意志，战争也锤炼了同一战壕人们间的友情。刘社长得悉我们境况，立即与位于市内牡丹峰山麓的朝鲜通讯社电台联系。这个电台所在地，凿有 4 个山洞，里面互通，经刘社长一说，朝鲜战友立即腾出一孔，让给我们。洞前仍然是那条通往前线的干道，我们把站牌立在洞口。这里与新华社分社相距甚近，约百米许。刘社长还引荐一位用左手记录的《真理报》记者，采访我们。我记得我的发言用了一句朝鲜话结尾：“美国人‘蒙古古里汗戛儿’！”指美国的侵朝行动像蠢人一样。

不久，我们约请刘社长与分社同志到基地作客。基地李指导员也是山东人，与刘社长同乡。两人攀谈，十分投机。他们都有酒量，互劝不止。刘社长说：“你们看，我这脑袋，平顶方脸，是块石头，老李，你那脑袋，椭圆的，鸡蛋型——碰不赢我的！”我趁机插言：“我们指导员脑袋，炮弹型，炸得开花岗岩的！”大家都哈哈笑着，痛饮不止……

此后，随着战况的变化，我们撤离平壤，开赴前线，再也不能见到刘社长。然而，刘社长鼓励我写稿的忠言，我始终没有忘记，无论在战争年代

还是和平环境里，我奋力笔耕，废稿成堆，只是不曾气馁，终于陆续在志愿军报、战士报、羊城晚报、解放军战士、解放军文艺等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消息、通讯和文艺作品；1958年在广州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中篇小说《青春的火花》；之后，我来到贵州，出了一本长篇叙事诗《芒细与榴梅》，一部反映朝鲜战争的长篇小说《硝烟梦》，一部自选文集《往事非烟却似火》，还有8本新闻理论专著。1987年，我被当年军大湖南分校副政委张平凯将军物色，协助他在北京修改《彭德怀率师援朝》一书。这时张平凯将军已是兵团级首长，他应我的要求，派他儿子张惕远，乘专用车，在北京复外新华社宿舍找到了我阔别37年的老师加战友刘桂梁。他在新华社国际部负责多年，现为新华社高级编辑兼中国新闻学院教授。显然，他认不出我来了，但是我依然能辨别出他盘子脸和略呈方形的头颅。我提及往事，他如梦初醒，双手捧握胸前，连声“感激”不止。他介绍了他近40年的变迁。这时，我从提包里取出两瓶酒，这是我在北京军区第四招待所改书的住处买的，包装格外精美。刘老怎么也不肯接受。我说：“当年你要我的汽油，喝我的酒，一点也不客气，现在竟这样‘两袖清风’了？”

“不，不，不！”他说，“我现有个毛病，不能沾酒。况且，我又不能见它，见到它，一张嘴，我这条命就可能呜呼哀哉了！”

我只得摇头，张惕远为我把两瓶酒收拾好。刘老向我们详谈了他当年接触彭老总和金日成元帅的一些场景，末了他还带着我们寻找当年在朝鲜战地采访过的记者。

《彭德怀率师援朝》一书，已于1990年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张平凯将军特意在前言中提及我修改此书一事。正当我要将此书馈赠一本给刘桂梁同志的时候，却不料我在一张《新闻出版报》第一版上看到了刘桂梁同志去世的消息。

他是我在战火里结识的启蒙老师，他是与我在同一战地互相关心的战友。他离开了人世，往事非烟却似火。他作为一名热心的记者，其风范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

作者单位：贵州日报

在朱老总面前，大家都成了孩子

——回忆 1957 年的一次采访

喻权域

1957 年 3 月上旬的一天下午，我正坐在新华社四川分社的大办公室里，分社社长邵挺军推门进来，要我夜里到省政府外事办公室去参加一个会。

到了那里才知道，由威廉·西罗基总理率领的捷克斯洛伐克党政代表团即将访华，并将到成都来访问。他们之所以要来成都，是因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朱德委员长正在成都。去年，朱老总曾去捷克斯洛伐克访问，给他们留下很美好、很深刻的印象，此次访华，捷方要求会见朱德元帅。我国外交部告知，朱德委员长到四川去了，我们请他回北京来会见你们。捷方西罗基总理说，朱德元帅是中国也是亚洲的大英雄，怎能劳动他？我们去成都见他吧，也看看他的家乡是个什么样儿。

主持会议的明朗同志（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四川省外事办公室主任）说：这是四川解放以来，不，是四川有史以来第一次接待外国总理，一定要把接待工作做好。

明朗同志看了我几眼，缓缓地说：“你回去告诉邵挺军，这次外事活动的文字报道由新华社负责，你们新华社要派一名得力的党员记者来采访报道。”我听出了他的意思，嫌我太年轻、太嫩（我当时只有 21 岁半）。

我回去向邵挺军同志汇报。他想了一想说：“由你去采访报道吧。其他的党员记者都下乡了，在家的党员记者只有你一个。”

省外办再次开会那天晚上，明朗同志看到又是我出席，便打趣道：“哈，你就是新华社的得力记者啊！”我也用玩笑口气回答：“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嘛！”

这次会议有外交部派来“打前站”的一位副部长参加。他说，昨天去向朱德委员长作了汇报，请朱老总出面接待。朱老总说，他是请假来四川

休息的，从事这样的国务活动，他得向中央请示。朱老总的纪律性真强，他当即给周恩来总理挂了长途电话。周总理说：“贵宾专程去成都看望您，您当然应该热情接待。”这样，朱老总才欣然同意出面接待。

明朗同志说，朱老总交代，捷克斯洛伐克同志参观访问时，我们要如实介绍，不许弄虚作假糊弄外国同志。朱老总说，他在捷克斯洛伐克访问一个村子，那里每户农民都住一幢小洋楼。厅里还有钢琴。朱老总怀疑是故意摆给他看的，要求多看几家。主人陪他一连看了十几家，家家如此。朱老总请女主人弹一曲来听听，女主人当场演奏，这说明确实是她家自备自弹的钢琴。朱老总在参观途中经常临时叫停车，进工人农民家中参观，家家差不多。朱老总说，我们的农民还很穷，别怕在外国同志面前露穷相。我们要向他们学习，艰苦奋斗几十年，争取富裕起来。

3月14日上午，我早早乘车去成都凤凰山机场。那年头的凤凰山机场没什么建筑物，临时搭了个彩棚，放些桌椅、茶杯，就算是候机室。省里的党政军首长和各民主党派负责同志（捷方代表团里也有民主党派）很快到齐了。因为是第一次接待外国的高级代表团，大家有些紧张，全都站在棚外，个个严肃庄重，没有人说话。稍远处是几千欢迎群众，人们不看天空，只看机场外的公路——想亲眼见到朱老总。

远处开来两辆小轿车。大家以为是朱老总，热烈鼓掌，鼓乐齐鸣，一拥而上。那两辆小汽车飞快驰来，在欢迎人群前面来个急刹车。车内跳下几个人连连挥手大喊：“别鼓掌，别鼓掌，朱老总还在后面！”

过了几分钟，远处又来了3辆小汽车。车行中速，到了欢迎人群前面，缓缓停下。车门开处，下来的正是朱德元帅和夫人康克清。大家先是一愣，接着就爆发出一片欢呼声。带锣鼓的忘了敲锣打鼓，几千人只顾高喊：“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朱老总慈祥地向人群挥手致意，并与近处的人握手，一步一步地向彩棚这边走来。彩棚边的要员们逐一上前问好，握手。我站在一旁发愣，不知道我有没有与朱老总握手的资格。朱老总与省里的要员们握手后，跨进棚里，很有礼貌地与小服务员们逐一握手。我胆壮了，也走上前，把手伸向朱德元帅。

朱老总用两只温暖的大手握住我的右手，慈眉善目地看着我，那是诚恳的、亲切的、同志对同志的目光。在他眼里，人人平等，根本就没有尊

卑、上下的区别。40多年来，我每一想起那情景就要自责：为什么我当时不伸出两只手呢？朱老总是用两只手来握的啊！

握手毕，朱老总没有坐下，而是走到棚外，笑咪咪地与大家站在一起。

胸前挂满勋章、威风凛凛的贺炳炎上将（成都军区司令员），像小青年似的蹿到朱老总面前，拉着朱老总衣襟，向朱老总脸上左看右瞧。他故意惊诧地说：“总司令，您好像瘦了些。”

朱老总看出贺炳炎要开玩笑，只嘿嘿地笑，没有说话。贺炳炎回头大声嚷道：“康大姐！你没有照顾好我们的总司令。总司令瘦了，你要负责任，你要向大家作检讨！”

康克清同志正在旁边与人闲谈。听到贺司令员叫嚷，她回过头来，以大嫂子对调皮的小叔子说话的那种语气笑骂道：“就你个贺炳炎的闲话多。看我回头告诉××（指贺炳炎的夫人，可惜我没听清），让她管管你。”

全场哄堂大笑。一瞬间，在场的有“要员”都变成了“小孩子”。大家围着朱老总看，有的说“果然瘦了些”。有的说“没有瘦”。朱老总嘿嘿地笑，不表态。平时不苟言笑的邓锡侯副省长笑道：“贺司令员，你冤枉我们的康大姐了！朱总司令红光满面，哪来的瘦？”

康克清得意地拍手道：“贺司令员，贺上将，你输了！”贺炳炎说：“你们妇联好威风啊，哪个敢惹你们妇联的人？你是全国妇联副主席，他们当然要偏向你。”众人又是大笑。

朱老总慈祥地问：“炳炎同志，听说你经常乘车到大山里去打猎，是吧？”康大姐打趣道：“你当司令员，不坐司令部，往深山老林里钻什么？”贺炳炎做了个苦笑的样子：“司令部里闷得慌。我是当兵的，长久不打枪，还算兵吗？成都坝子人口这么稠密，打靶要惊动老百姓，我只好钻进深山老林去放几枪，练练手艺。”康大姐笑道：“你打猎可要小心啊。你若把剩下的这只手臂摔断了，那就当不成司令员，也当不成兵了。”

众人笑得更欢。小服务员们也一起笑。

李大章省长笑对大家说：“我们中国有两位独臂将军。贺炳炎司令员在战场上打断了右臂，中将余秋里同志在战场上打断了左臂。他们俩如果并排站在一起，不知道的人，看不出他们各自只有一只手。”

贺炳炎继续与康克清开玩笑，斗嘴。成都市委第一书记廖井丹转换话题。

廖井丹说：“总司令，你是四川人，你说说，我们四川文学界是怎么回事？作家协会两个主席，一个沙汀，个头那么高，专写短篇小说，不写长篇；一个李劫人，个子这么矮，专写长篇小说，不写短篇。”

朱老总望了望高高的沙汀，看了看矮矮的李劫人，抿嘴而笑。

沙汀幽默地说：“写长篇，我写不过李劫老，写不过巴金，只好写点短篇小说充数”。

李劫人性格开朗，一向活跃。他是成都市副市长，市里开会，有他必然有笑声。今天在朱老总面前，他更欢畅，更来劲了。

“总司令，你把我调出四川，调到别的省去吧。我最不喜欢和沙汀在一起共事了。他写小说的水平比我高，他的个子又比我高出两个头。我跟他谈话，要仰面朝天，好费劲哟！谈上半个钟点，我的颈项发酸，腰也发痛。”

全场大笑。朱老总说：“你多来和我摆摆龙门阵嘛！我和你差不多高，能平等说话，两不费劲。”

李劫人上前与朱老总比量一下，连声说：“不行不行，你还是比我高出一个头。”

李劫人眉飞色舞，连比带划地对大家说：“我只喜欢和沈钧儒沈老在一起。他比我矮一个头，我与他谈话是居高临下，那简直是一种享受……”

在场的人笑得前仰后合，把什么“上级、下级”忘得干干净净。我想，正是这种平等精神，使大家亲密无间，团结得很紧。

天上响起马达轰鸣声，贵宾的专机到了。一群“老孩子”赶快收敛笑容，整理衣冠，恢复尊严。朱老总的秘书走过来，掏出一把小梳子为朱老总梳头，用手巾掸掉朱老总肩上的头屑和皮鞋上的灰尘，整理好衣服。康克清同志过来，上下看了一遍，点头认可。大家依次向停机坪走去，一切按外交礼仪行事。

朱德委员长和夫人康克清陪西罗基总理及其夫人与欢迎人群见面，挥手致意。我看数千群众虽然喊着欢迎外宾的口号，但目光全对着朱老总和康克清同志。我悄悄问外交部来的一位年轻官员：“这会不会给外宾留下个不礼貌的印象？”他摊开手说：“有什么办法呢？”接着又笑道：“我看外宾不会计较。朱老总是苏联和东欧各国人民崇敬的大英雄。朱老总访问苏联、东欧时，那里的人群也是只看他，一个劲儿向他欢呼。”

当天下午，朱德委员长与贵宾们亲切座谈。夜里，李大章省长举行晚宴招待贵宾，并请贵宾们观看晚会。朱德委员长一直作陪。次日，贵宾们去都江堰、郫县等地参观。这些新闻，我都及时作了报道。

两天后，贵宾离开成都去北京，我方原班人马到凤凰山机场送行。朱老总和夫人康克清陪西罗基总理和夫人乘车到机场，握手如仪，亲切告别。

专机起飞后，李井泉、李大章请朱老总去青羊宫看花会。朱老总请省里各民主党派负责同志一起去。朱老总交待廖井丹：花会要照常开放，不得阻挡其他游客；大家分成几组行动，免得惊扰群众。

一行人来到青羊宫，约好碰头的时间、地点，就分散去看花会。秘书给朱老总戴上一个大口罩，游人还是认出来了，大家不看花会看朱老总。警卫人员费了很大劲劝说，才使游人安静下来，不拥挤，大家分散到各场馆等候朱老总前去。

参观结束，朱老总和民主党派领导同志来到青羊宫管理处那个院子。他们进里面那个不大的会议室休息、座谈。我们几位记者，以及秘书们、警卫们、驾驶员们聚在院子里等候。大家七嘴八舌，讲的是一个心愿：想与朱老总合照一张相。

不知怎么的，院子里的人一致推举我进去请示。我说：“我可不敢去。我们想与朱老总合影，只有请李政委（李井泉，四川省委书记兼成都军区政委）出面。要向李政委汇报，必须通过他的秘书。他那秘书厉害得很，好训人。上次在新繁县禾登乡新民社，恰逢李政委陪彭德怀元帅去视察，我和几位作家站在大路旁边的田坎上，想在彭老总经过时多看几眼。李政委的秘书走过来，熊了我们一顿，硬把我们赶开了，气得几位作家在背后大骂那位秘书。今天，那位秘书就在里面，坐在李政委身后。我去找他，肯定会碰钉子。”

在场的人嘀咕道：错过了今天这个机会，遗憾终生啦！

我的童心发作，灵机一动，想出了个孩子气的主意。我请大家动手，把周围办公室的藤椅搬出来，在院里摆放成月牙形。请四川日报摄影记者李焯同志拿出三角架，架好照相机，布置出个合影留念的场面。我说：“我不进去请示，你们也别再议论。待会儿朱老总出来，如果他往椅子上坐，我们就大大方方地站到藤椅后面去，参加合影，什么话也别提。”大家一致同意。

过了一阵，朱老总一行从休息室里出来了。一看院子里摆的藤椅，架的照相机，朱老总笑嘻嘻地走过去在藤椅上坐下。李井泉、李大章与各民主党派领导同志互相谦让一阵，依次坐了下去。

有慈祥如祖父的朱老总在，我们不怕谁来训，大胆地走到藤椅后面去站好。李煊同志按动快门，照了两张；又请一位同志换他按快门，再照两张。

照完，朱老总和省里各位领导相互告别，分头登车而去。我们留在院子里的这些人齐声欢呼：“成功了！”大家高兴得握手、拥抱。

尽管如此，我回到新华社写稿时，心里还是忐忑不安，生怕上头来查问，来责怪。

结果出人意料。参加合影的领导同志都叫秘书打电话来要照片，而且要放大的，越大越好。他们都交代，由他们自付洗印、放大费。

朱老总的秘书也来电话要照片，还笑着转述了朱老总的话：“我经常见记者同志给我照相，从不见他们送一张照片给我。是不是怕我不给钱呀？”

李煊和我，欢喜得像孩子似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东风压倒西风

——毛主席访苏散记

李克

1957年11月，毛泽东主席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苏联十月革命节40周年庆典，并出席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这是毛主席第二次访问苏联，是他一生中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国访问。

新华社莫斯科分社为向国内外充分报道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全力以赴。分社负责人李楠主要是在分社坐镇指挥，参加一些重大采访；我和沈一鸣同志外出采写毛主席在莫斯科的日常活动。

—

11月2日下午3时许，毛主席和代表团乘坐的银白色专机降落在伏努克沃机场跑道上。毛主席身穿呢大衣，头戴宽沿礼帽。他一走出机舱，机场上立即响起热烈的掌声。毛主席向大家挥手致意，随后缓缓走下舷梯，接受了少先队员献的鲜花。早已迎候在机场的苏联党政领导人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等迎上前去与毛主席握手、拥抱。毛主席在机场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后，与苏联各界人士见面握手。当我驻苏联大使刘晓介绍说：“这是使馆人员和留学生代表”时，毛主席笑着挥了挥手，用带着很浓的湖南口音说：“噢！中国同志，那就不拉手了！”亲眼目睹毛主席风采的中国同志感到毛主席的举止、言谈是那么亲切、自然。

毛主席本来事先就向苏共领导打了招呼，希望迎接的礼仪从简，但苏方领导人仍全体出动欢迎，并组织了盛大的群众欢迎场面，在机场检阅了三军仪仗队。在前往住处的途中，毛主席对陪同的赫鲁晓夫说：“我不是请你们不要搞仪仗队嘛，怎么还这么隆重？”赫鲁晓夫回答说：“是的，尤金（苏驻华大使）向我们转达了您的意见，我们专门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讨